

语法转喻框架下“N的V” 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

吴吉东 闫倩倩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6)

摘要:汉语“N的V”结构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从语法转喻视角,架构“N的V”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CCL中的真实语料,可探讨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动词V进入“N的N'”构式的中心语N'位置,受到该构式的压制,从表动作的源概念转喻为表事件的目标概念;“N的V”的概念转喻触发其语法结构变化,体现在对动词V属性的重新范畴化和该结构作主、宾时对句子谓词的选择上;“N的V”的语法结构对其概念转喻有制约作用,体现在该结构的语义指称性和N与V的语义关联度上;语境对“N的V”结构的概念转喻和语法结构之间的双向互动具有调控作用,体现在单音节动词进入该结构的允准条件和“N的V”结构歧义的消解上。

关键词:N的V;语法转喻;形成机制;认知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2-0013-11

0 引言

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书《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54)将“N的V”^①视为汉语特有结构,该结构涉及汉语中名词和动词的划界以及主要词类范畴的划分问题(高航,2013)。学界对“N的V”结构的研究主要聚焦在“V”的性质上,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V”是“名物化”的产物,认为该结构中的动词“V”发生了名词化(张志公,1957;胡裕树,1994);第二,“V”仍是动词,认为汉语的语言事实完全不支持名物化的说法(朱德熙

收稿日期:2021-08-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英复句句法与语义界面的认知语法研究”(20BY00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入场的汉英复句认知工作机制对比研究”(20YYB001)和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语法转喻视角下‘N的V’结构认知工作机制研究”(KYCX21_105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吉东,男,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研究。

闫倩倩,女,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

①关于“N的V”,学界有结构、格式、构式、短语等表述,本文将之统称为“N的V”结构,把“N的N'”称为“N的N'”构式。

引用格式:吴吉东,闫倩倩.语法转喻框架下“N的V”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J].外国语文,2024(2):13-23.

等,1961),即汉语的动词和形容词无需改变形式,可以直接充当主、宾语(朱德熙,1983);第三,“V”的词性处于动词向名词过渡的中间状态,认为词类的内部是不匀称的,有的成员是典型的,有的成员是非典型的,“V”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名词化倾向和/或弱动词性(王冬梅,2002)。

近年来,研究者基于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对“N的V”结构作认知阐释。沈家焯等(2000)将“N的V”结构视为一个具有“部分-整体”关系中的“参照体-目标”构式,其语义为“指称已经发生或实现、或至少在心理上预实现的事件”,V作为目标,已经事物化和指称化,N作为参照体,具有较高的信息度、可及性和凸显度;高航(2009:80)探讨了“N的V”结构中“V”转化为名词的认知理据,认为“一般认知能力的概念物化”在V转化为名词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娄语竹(2008)将“N的V”结构看作一个构式,探究“V”如何获得其名词性质;牛然明等(2012)基于兰盖克(R. W. Langacker)的范畴化理论,将“N的V”视为领属构式“N的N”的一个非典型成员,从而实现动作的指称;金江等(2019)从构式压制的转喻性和体验性两个维度探讨动词名用机理,认为动词名用是构式压制所致,其转喻机制为“动作代事件”。

上述研究只是从“名物化”“参照体-目标”“一般认知能力”“构式”“范畴化”“构式压制”等一个侧面对“N的V”结构作探讨,缺少一个统一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对“N的V”结构的形成机制更是尚未涉猎。那么,“N的V”结构的形成机制到底是什么?本文拟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语法转喻视角,架构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力图解决“N的V”结构的形成机制问题,为该结构的教学和习得提供认知理据。

1 基于语法转喻的理论分析框架

语法转喻是一种概念转喻,是人类的转喻思维方式在语法结构中的体现。语法转喻对语法结构中的词类分布和句法形态等方面产生影响。关于转喻操作机制,学界主要有转喻映射观、转喻凸显观和心理可及观三种观点。近年来,较多学者倾向于心理可及观,将转喻视为源概念为目标概念提供心理可及的认知过程(吴淑琼,2013:85-89)。其中,兰盖克(Langacker,2004)认为,转喻本质上是一种参照点现象:以转喻表达式所表征的实体作为参照点,为理想的目标,即实际指称的实体,提供心理通道;沈家焯(1999)、高航(2007)和袁毓林(2018)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转喻的认知基础是源域和目标域在同一个“认知框架”内,且它们之间是毗邻关系(contiguity)。概言之,转喻发生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ICM)中,基于概念上的邻近性,目标域通过源域在心理上实现通达。

国外语法转喻研究开始较早,且成果丰硕。其中,鲁伊斯·德·门多萨等(Ruiz de Mendoza et al., 2008)根据抽象程度,将转喻分为低层转喻和高层转喻,将语法转喻界定为

“对形态和/或句法结构产生影响的高层转喻或类属转喻”,并深入探讨中动构式、起始结构、充盈结构、静态谓词的动作构式等语法结构的转喻理据;潘瑟等(Panther et al., 2009)将语法转喻定义为“对功能词、语法词素和词类的分布属性产生影响的概念转喻”,探讨了派生词素“-er”、感知主语结构、独立条件句等的转喻理据。

国内,沈家煊(1999)首先提出“语法转喻”这一术语,他基于汉语“的”字结构研究,指出语法中的“转指”本质上就是“转喻”,认为语法转喻就是转喻这种一般的认知方式在语法上的体现;杨成虎(2011:118-121)将语法转喻定义为“用来解决形式结构和逻辑结构间语义冲突的转喻性概念结构”,并建构了语法转喻的三角模型;吴淑琼(2011)承袭转喻的“心理可及观”,认为语法转喻是在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式中,源概念为目标概念提供心理可及的认知参照点现象,并建构了语法转喻的运作模型,突出概念转喻和语法结构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及语境对语法转喻操作的调控作用;此外,有研究者运用语法转喻理论探讨了动词不定式中的宾语提升现象和领主属宾句的生成机制、限制因素等(刘金路, 2016; 杨唐峰, 2019)。

语法转喻为探究“N的V”结构运作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我们借鉴国内外语法转喻研究成果,尤其吴淑琼(2013:89-100)的语法转喻运作模型,构建“N的V”结构形成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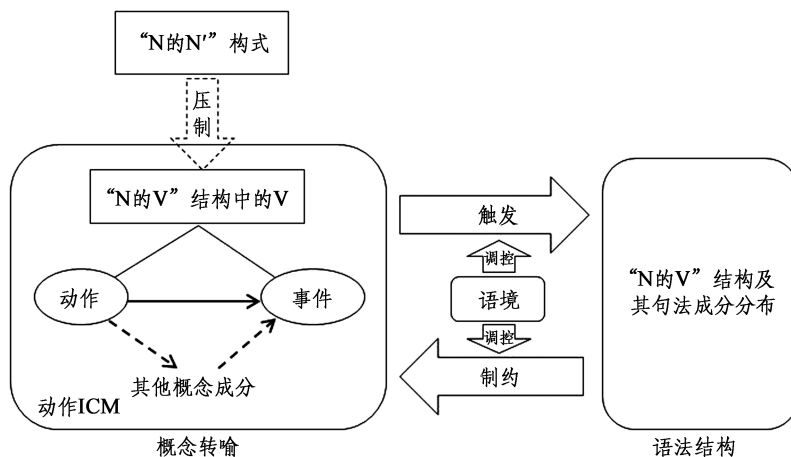


图1 “N的V”结构形成机制模型(吴淑琼, 2013:89-100)

图1中,动词V的ICM包括众多的参与者及场景,这些要素彼此关联,具有概念上的邻近性。动词V进入到“N的N”构式,受典型领属构式“N的N”的压制(虚线空心箭头),动词V的动作语义可作为源概念,为目标概念,即概念化事件,提供心理通道(Langacker, 1993;沈家煊, 1999;高航, 2007等),实现“动作代事件”概念转喻(实线箭头),而动词V的其他概念成分难以作为源概念,激活目标概念(虚线箭头)。概念转喻触发语法结构产生变化(右向空心箭头),即对“N的V”结构中的动词V重新范畴化和“N的

V”结构作主、宾时对谓词特定选择(Langacker, 2008:98;王冬梅, 2010);语法结构对概念转喻具有制约作用(左向空心箭头),即“N的V”结构语义特征和语义关联度对概念转喻的限制。语境在概念转喻和语法结构双向互动过程中发挥着调控作用(上下空心箭头),即特定语境一方面成为部分单音节动词进入“N的V”结构的允准条件,另一方面又是消解“N的V”结构歧义的有效手段(高航, 2013)。下面基于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CCL)中真实语料(除特别标明外),对“N的V”结构形成机制模型作进一步探究。

2 “N的V”结构的语法转喻分析

2.1 “N的V”结构语法转喻的动因

“N的N'”构式由三个语言小单位“N”“的”“N'”构成,其中“的”为固定不变的常量,“N”和“N'”随着进入的成分不同而发生变化,是有规律的变量(高航, 2007)。“N的N'”构式是一个向心结构,“N”和“N'”通过“的”建立起修饰与被修饰的语法关系,“N'”是这一结构的中心语,用以表征对事物指称(李云靖, 2008)。

- (1) 他的眼睛^①
- (2) 图书馆的书
- (3) 他的离开
- (4) 敌人的进攻

例(1)中“眼睛”和例(2)中“书”是名词,无需任何认知或心理操作,直接进入“N的N'”构式中的中心语N',是典型的领属关系;而例(3)“离开”和例(4)中的“进攻”是动词,进入“N的N'”构式中的中心语N'时,违背了该构式对中心语“N'”的名词性要求,“N的N'”构式语义与动词V词汇义产生冲突,是非典型的领属关系(Langacker, 1987;牛然明等2012)。然而,在特定言语情境中,例(3)和例(4)是可以接受的。

(5) 他的离开,意味着自由主义规范政治哲学理论的辉煌告一段落,也意味着政治哲学的辉煌告一段落。

- (6) 他无力地挥舞着长剑,在绝境中抵抗敌人的进攻。

在例(5)和(6)中,“N的N'”构式语义对动词V词义产生压制,使得“离开”和“进攻”从凸显动作转为凸显事件,成为准名词成分,来服从它们所内嵌的“N的N'”构式语义。在压制过程中,“动作代事件”是实现“N的V”结构的心理通达机制。(Michaelis, 2003;金江等, 2019)

具体来说,当动词V“离开”和“进攻”进入“N的N'”构式后,其典型的动作意义难以用于指称。根据兰盖克(Langacker, 1993)的一般认知能力中的参照点能力,概念化主体以一

① 本文例句除标注*及特别标明的外,均来自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xiandai)。

个实体来建立与另一个实体的心理接触。在“N的V”结构中,动词V“离开”和“进攻”的动作和事件之间具有邻近性,前者为后者提供心理通道,经过“动作代事件”的认知或心理操作,动词V“离开”和“进攻”临时表征事件(沈家煊,1999;袁毓林,2018),从而解除“N的N'”构式语义和动词V“离开”“进攻”之间的冲突。

2.2“N的V”结构语法转喻的语法效应

2.2.1“N的V”结构中的V重新范畴化

范畴是指认知主体对外界事物属性所做出的主观概括,是以主客观互动为基础对事物所作的分类,而范畴化是指基于体验对外界事物进行主观概括和属类划分的心智过程(王寅,2006:124)。兰盖克(Langacker,2008:98)指出,表达式的语法范畴并不取决于整体概念内容,而取决于具体显面的性质,由于识解方式不同,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语法结构中体现为不同的词类范畴。

根据兰盖克的上述范畴观,动词V进入“N的N'”构式中的中心语N'的位置,动词V受到“N的N'”构式语义压制,其范畴属性发生了根本变化,认知主体需对“N的V”结构重新识解,重新范畴化。认知主体凭借参照点能力,对始源的动词V进行认知操作,将其转喻为事件,动词V的动词性范畴特征被弱化,名词性范畴特征被凸显,动词V临时被划分到名词范畴中。概言之,“动作代事件”实现动词V在动词性特征和名词性特征之间心理通达,动词V在“N的V”结构中被重新范畴化为名词。这一点从其搭配成分受到限制得到证明。如:

- (7) 母亲的批评让他脸上发烧,心里感到很不痛快。
- (8)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一个批评是:质疑宏大叙事会减少知识的可能性。
- (9) * 母亲的批评得恰如其分使他心服口服。
- (10) * 母亲的批评使他心服口服。

例(7)中的“批评”被临时范畴化为名词,分配到主语的位置上;例(8)中的“批评”在被临时范畴化为名词基础上进一步量化,前面加了数量词“一个”,即动词V被范畴化为名词,可以和数量词搭配;例(9)和(10)中的“批评”由于被临时范畴化为名词,失去了动词的部分属性,不能带补足成分“得”,也不能带宾语“他”,即动词V被范畴化为名词后,不能与补足成分及宾语搭配(Langacker,2008:98)。

2.2.2“N的V”结构的谓词选择

“N的V”结构中的动词V通过“动作代事件”的转喻操作,获得了指称性含义,在词类范畴上具有名词性特征,在句法功能上,可以充当谓词的主语和宾语。作为一种特殊的定中结构短语,“N的V”所指事件承载新信息,与谓词的关系十分紧密(李翠,2015),对谓词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和限制。我们对含有“N的V”结构作主语的相关语料作整理和归纳,

大致已有以下五类谓词(陈一, 1998):

一、表示判断类动词,如“是”“属于”“成(为)”等^①

(11)文化的传播是文化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扩散,是文化在空间上的流动。

(12)航天业的发展属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范畴

二、表示说明类动词,如“标志”“说明”“表明”等。

(13)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语法研究从此走进了世界的视野,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14)入伙协议的签订表明原合伙人对入伙人的接受,也表明了入伙人的入伙意愿

三、表示致使类动词,如“产生”“引起”等。

(15)几十个音位的组合产生几千个符号的形式,所以从音位到语素同时又有数量上的飞跃。

(1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继续教育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极端重视。

四、表示存现类动词,如“有”“没有”等

(17)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有其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

(18)民间神鬼的塑造没有一定的规则,大到山川河流,小到木石鸟兽,都有神灵来主宰。

五、表示使令类动词,如“使”“让”“令”等

(19)声卡的加入使得计算机具备了处理音频信号的能力。

(20)胡适的讲述让徽因和思成仿佛身临其境。

上述例句“N的V”结构临时指称事件,作主语时处于话题的中心地位,要求谓词不能表示具体的动作或行为,而应侧重于对某种关系状态的描写、说明和判断。因此,表说明、判断、存在、致使等非动作性动词可被其选作谓词。

“N的V”结构作宾语对所接谓词的要求要比其作主语时低一些。王冬梅(2010)对“N的V”结构作宾语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一个谓词能否带“N的V”结构作宾语,和它所控制的事件的现实性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对含有“N的V”结构作宾语的相关语料作整理和归纳,大致有以下三类谓词:

一、表示意愿、感知类动词,如“注意”“期待”“容忍”等

(21)他说,拉莫斯总统访华是一件大事,中国领导人正在期待着他的访问。

(22)为了调理脾胃功能,更要注意饮食的调节。

二、表示获取、遭遇类动词,如“得到”“受到”“经过”等

^① 例句中词语下划线表示凸显这类动词。

(23)由此可见,我国金融租赁公司在资金来源上必须要得到政府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

(24)人都这样的,要经过内心的挣扎,要经过天人交战的。

三、表示强化、维持类动词,如“加快”“促进”“推动”等

(25)我们从国外引进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是为了促进汉语的研究与教学。

(26)要让孩子习惯于大人安置他入睡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最好固定不变,天天如此,这能加快孩子的入睡。

“N的V”结构作宾语对所接谓词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该谓词对“N的V”指称事件的控制,因此,这类的谓词多表为感知、获得、强化等词义的动词。

2.3 “N的V”结构语义对语法转喻的制约作用

2.3.1 “N的V”结构语义特征对概念转喻的制约

语法转喻“动作代事件”是“N的V”结构形成的认知基础,动词V所表示的动作可以从心理上激活相应的概念化的事件,这要求动词V不用任何额外的形态标记就能够实现转指或自指。“指称性”是“N的V”结构的根本语义特征,不具备潜在指称性的动词V进入“N的N'”构式后,无法满足指称事件的需求,会导致语义异常。

(27a) *信息的用就是利用所提取的信息对新信息进行认知加工。

(27b) 信息的使用就是利用所提取的信息对新信息进行认知加工。

(28a) *杂交水稻的种,在相同的条件下,可以增产10%~20%。

(28b) 杂交水稻的种植,在相同的条件下,可以增产10%~20%。

例(27a)和例(28a)中的单音节动词“用”和“种”不具备潜在的指称性,进入“N的N'”构式中的中心语法N'位置,不能作为源概念动作从心理上激活相应的概念化事件,因而不能被接受。例(27b)和例(28b)中的双音节动词“使用”和“种植”具备潜在的指称,可作为源概念动作从心理上激活相应概念事件,因而可以被接受(Langacker, 1993:9)。

高航(2013)基于2000年《人民日报》全文标注语料库,对“N的V”结构中的动词V进行考察,发现单音节动词出现在“N的V”结构中的概率极低,能进入该结构的单音节动词只有“骗”“请”“死”三例。詹卫东(1998)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动词用法词典》中的1,316个单音节动词,仅有“爱”“死”“笑”“哭”可以进入“N的V”结构。朱德熙(1982:54)把能够进入“N的V”结构的动词,如“生产”“表演”“调查”等双音节动词,称为“名动词”,兼具名词的语法功能,可实现动词V语法转喻;而“吃”“走”“跑”等单音节动词,突显动词的语法功能,在缺乏语境情境下,很难实现动词V语法转喻。

在现代汉语中,动词范畴的典型成员是单音节的,处于动词范畴的中心位置;而双音节动词是动词范畴的非典型成员,处于动词范畴的边缘(王冬梅,2010:19)。较单音节动词,

双音节动词在语义上侧重更为复杂的行为、活动、过程等,更容易获得名词的指称性语义。简言之,“N的V”结构语义的指称性对进入该结构的动词V具有过滤作用,双音节动词较单音节动词更容易进入“N的V”结构,实现动词V的语法转喻。

2.3.2 “N”与“V”语义关联度对概念转喻的制约

在“N的V”结构中,N从本质上说是认知参照点,概念化主体通过认知参照点N,在心理上由动词V表动作的源概念“访问”其表事件的目标概念,完成“动作代事件”的认知操作(Langacker, 1993:1;高航, 2007)。N除了提供认知参照点外,对动词V过程/事件还发挥领属者作用。在“N的V”结构中,并不是所有的名词N都可以担任认知参照点/领属者,N和V的语义成分的关联度起着决定性作用。通常来说,N和V的语义成分的关联度越高,动词V越容易由源概念动作语法转喻为目标概念事件;反之,则不然。例如:

(29) 图书的出版

(30) 老师的批评

(31) * 图书的批评

在例(29)和(30)中,“图书”是“出版”的受事,“老师”是“批评”的施事,“图书”和“出版”“老师”和“批评”之间是常规组构,其语义关联度高,“图书”和“老师”可以作为认知参照点/领属者,在心理上可顺利“访问”由“出版”和“批评”动作转指的事件,实现“动作代事件”的语法转喻;在例(31)中,“图书”和“批评”之间是非常规组构,其语义关联度低,“图书”作为认知参照点/领属者,在心理上无法触发由“批评”动作转指事件,无法实现“动作代事件”语法转喻,因此,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例(31)通常不能被接受。

2.4 语境对“N的V”结构外部调控作用

2.4.1 语境对“N的V”概念转喻的外部调控

一定的语境对“N的V”结构的可接受性有显著的影响(詹卫东, 1998)。前文提到,单音节动词作为动词范畴的典型成员,指称性不强,通常情况下难以进入“N的V”结构。然而,在特定言语情境中,部分单音节动词也可以进入“N的V”结构,触发“动作代事件”语法转喻操作(高航, 2013)。例如:

(32) 杨笑了。他的笑让旁观者觉得他只能选择笑来表现自己的感情。

(33) 禽滑:“大王,如果孙臆逃走,危害大王与寡君,禽滑就是死,也要喷他一脸鲜血。可是,他的走对大王有百利而无一害,因而禽滑才任他逃走。”

例(32)和(33)中的“笑”和“走”都是单音节动词,是动词范畴中的典型成员,按照朱德熙(1982)、王冬梅(2010)等学者的观点,此类动词难以发生词类转化,因而无法实现“动作代事件”的语法转喻。然而,以上几个例子中“N的V”结构出现前都有一个与之相关的陈述表达,该表达中的主语与“N”一致、谓词与“V”一致,可以看作是“N的V”的提前陈

述:例(33)中“他的笑”与前文中“杨笑了”相照应;例(33)中“他的走”与“孙膑逃走”相照应。有了提前陈述的铺垫,单音节动词“笑”和“走”进入“N的V”结构显得不那么突兀,可以看作是对各自提前陈述事件的指称,因而可以通过“动作代事件”转喻得到合理解读。

另外,有一些例子中“N的V”结构与提前陈述的主谓并非完全一致,例如:

(34)他利用我。我过去不明世事,受他的骗,为了家里几口,给他卖力气,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啥地方不好混碗饭吃,为啥要听他摆布?我想另外找点事体做。

(35)今夜,今夜我做了一个夜游人,我的游,也就在我想象中,因为我的脚还不曾远离过井台畔。

在例(34)和(35)中,在“N的V”结构出现前,语篇中未出现以V为谓词的提前陈述,但语境中出现了与V相关的背景知识的表述,即“N的V”的提前陈述隐含在语境之中:例(34)中语境信息“他利用我”可以推导出“他曾欺骗我”;例(35)中语境信息“今夜我作了夜游人”可以推导出“我去夜游”。有了隐含的提前陈述事件,单音节动词“骗”和“游”进入“N的V”结构,可看作对隐含提前陈述事件的指称,因而可以通过“动作代事件”转喻得到合理解读(高航,2019)。

2.4.2 语境对“N的V”语法结构的外部调控

关于“N的V”结构内部的语义关系问题,詹卫东(1998)、王冬梅(2002)、王丽娟(2014)、方绪军等(2021)均认为,根据N的语义角色可将该结构分为两类:N为施事,即“N_施的V”;N为受事,即“N_受的V”。一价动词可以进入“N_施的V”,二价和三价动词理论上既可以进入“N_施的V”,也可以进入“N_受的V”(詹卫东,1998)。因此,当二价及以上动词进入“N的V”结构时,对N的语义选择存在多种情况,N可能是V的施事,也可能是V的受事,这正是汉语中“母亲的回忆”“诗歌的研究”等短语产生歧义的原因。为了消除歧义,需要借助语境建立起N和V唯一的语义关系。例如:

(36)母亲的回忆

(37)此后,对母亲的回忆,便与美丽的山水搅和在一起,每当想提笔描画自己的故乡时,妈妈被绑卖的悲惨情景便将美丽的画面撕得七零八落!

例(36)“母亲的回忆”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短语中的“母亲”既可能是“回忆”的施事,也可能是受事。将“母亲”看作施事时,短语与主谓结构“母亲回忆”意思相同;若将其看作受事时,短语与动宾结构“回忆母亲”意思一致。在例(37)中,在“母亲的回忆”前加上了介词“对”,明确了“回忆”的对象“母亲”,二者通过语境建立起了唯一的语义关系,从而消除了短语的歧义,实现对语法结构的外部调控。

3 结语

本研究从语法转喻视角,架构了“N的V”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北京大学汉语

语料库(CCL)中的真实语料,探讨“N的V”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语法转喻“动作代事件”是该结构形成的认知理据,“N的N'”构式义对动词V词汇义的压制是触发语法转喻的动因;概念转喻与语法结构之间双向互动,体现在“N的V”结构中动词V属性的重新范畴化和“N的V”结构作主、宾时对谓词的选择,以及“N的V”结构语义特征和语义关联度对概念转喻的制约;语境对“N的V”结构的概念转喻和语法结构的双向互动具有调控作用,前者体现在对单音节动词允准条件,后者体现在对“N的V”结构的歧义消解。本研究结果为“N的V”结构的教学和习得提供认知理据。

参考文献: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 1*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1-38.
- Langacker, R. W. 2004. Metonymy in Grammar [J]. 外国语(6): 2-24.
- Langacker, R.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chaelis, L. 2003. Headless Constructions and Coercion by Construction[G] // E. Francis & L. Michaelis. *Mismatch: Form-Function Incongruity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Grammar*. Stanford: CSLI.
- Panther, K. U., Thornburh, L. & A. Barcelona. 2009. *Metonymy and Metaphor in Grammar* [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Ruiz de Mendoza, I. F. & M. Pea. 2008. Grammatical Metonymy within the “Action” Frame in English and Spanish [G] // J. Mackenzie, M. González & E. Ivarez-González. *Current Trends in Constative Linguistics: 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 陈一. 1998. 动名兼类词与N的V/N结构[J]. 求是学刊(1): 87-89.
- 方绪军, 刘华. 2021. 基于构式家族观念的“NP的VP”及相关结构[J]. 汉语学习(2): 3-12.
- 高航. 2007. 现代汉语名动互转的认知语法考察[D]. 洛阳: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 高航. 2009. 认知语法与汉语转类问题[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高航. 2013. “N的V”结构的认知语法考察: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 外文研究(4): 24-34.
- 高航. 2019. 现代汉语回指构式中单音节动词的名词化: 认知语法视角[J]. 外国语(5): 23-32.
- 胡裕树, 范晓. 1994. 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J]. 中国语文(2): 81-85.
- 金江, 魏在江. 2019. 转喻性与体验性: 构式压制的两个维度——以动词为例[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4): 124-130.
- 黎锦熙. 1954. 新著国语文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翠. 2015. 基于语篇的现代汉语“NP的VP”构式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 李云靖. 2008. “NP+的+VP”结构的构式语法阐释[J]. 语言教学与研究(2): 75-81.
- 刘金路. 2016. 语法转喻视角下的宾语提升[J]. 牡丹江大学学报(4): 56-58.
- 娄语竹. 2018. 构式视野下的“N的V”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 牛然明, 高德文. 2012. 汉语“NP的VP”构式的构式语法新探[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5): 10-14.
- 沈家煊. 1999.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1): 3-15.

- 沈家煊, 王冬梅. 2000. “N的V”和“参照体—目标”构式[J]. 世界汉语教学(4): 25-32.
- 王冬梅. 2002. “N的V”结构中V的性质[J]. 语言教学与研究(4): 55-64.
- 王冬梅. 2010. 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丽娟. 2014. 汉语两类[N的V]结构的韵律句法考察[J]. 世界汉语教学(1): 72-79.
- 王寅. 2006. 认知语法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吴淑琼. 2011. 语法转喻的含义、特征和运作模式[J]. 外国语文(6): 75-80.
- 吴淑琼. 2013. 基于汉语句法结构的语法转喻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成虎. 2011. 语法转喻的认知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杨唐峰, 张秋杭. 2019.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领属关系对领主属宾句的制约[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 73-81.
- 袁毓林. 2018. 汉语中的概念转喻及其语法学后果[J]. 语言教学与研究(1): 30-43.
- 詹卫东. 1998. 关于“NP+的+VP”偏正结构[J]. 汉语学习(2): 24-28.
- 张志公. 1957. 汉语教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J]. 人民教育(4): 28-31.
- 朱德熙, 卢甲文, 马真. 1961. 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J].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报)(4): 53-66.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3. 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J]. 方言(1): 16-31.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 de V” Construc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WU Jidong YAN Qianqian

Abstract: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N de V”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academic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 de V”, and probes into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authentic data from CCL. It is argued that V enters the niche of the head of “N de V” construction and is coerced by its meaning, transferring from its source concept of action to its target concept of event through metonymy. The conceptual metonymy of “N de V” triggers the changes of its grammatical structur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recategorization of V and the choice of the predicate of a sentence in which “N de V” serves as the subject or the object.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N de V” has a restrictive effect on its conceptual metonymy, which is reflected in its semantic referentiality and the semantic relevance of N and V. The context plays a regulatory role in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ceptual metonymy of “N de V” construction and its grammatical structur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premising condition of monosyllable verbs entering this construction and the elimination of its meaning ambiguity.

Key words: N de V; grammatical metonymy; formation mechanism; cognition

责任编辑: 蒋勇军